

陳

写在封面

长征日记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！
曾经不止一次下决心坚持写下去，但也
不止一次半途而废。这是我的弱处，充
分表现了我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
可耻的脆弱。从今天起——1937.8.7.
坚决的把日记重日不间断的写下去，无
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斗时也好，行军
时也好，极度疲劳时也好，始终如一
的坚持下去，决不辜负党的嘱托，
没有一天不写，不写我的记载以外。

陈 1937.8.7.
1937.8.7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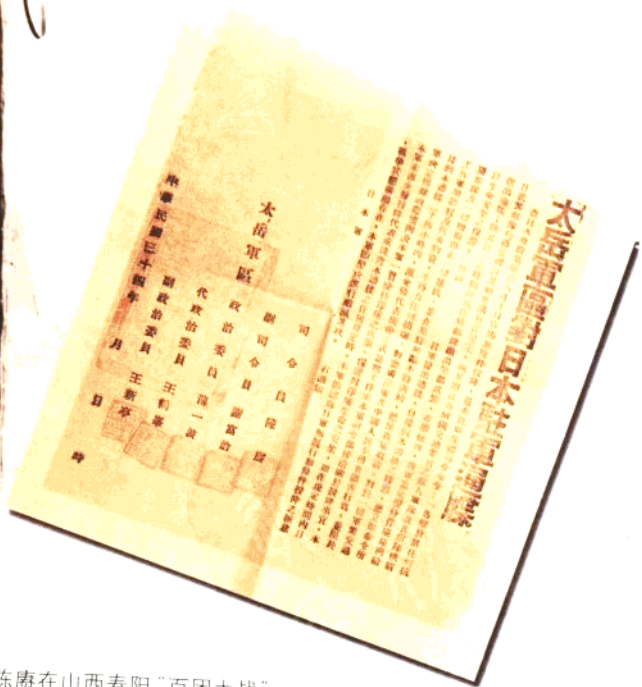
抗日战争时期的陈赓同志



1935年10月，陈赓在长征结束后调任红一师师长，在师部留影



1937年陈赓在《西行漫记》作者埃德加·斯诺镜头中的英姿



1940年8月，陈赓在山西寿阳“百团大战”的前线指挥



1946年夏，陈赓、傅涯与儿子知建在山西翼城合影



1948年5月宛西战役发起前，陈赓在向部队做动员讲话



1948年，陈赓在缴获的国民党军吉普车前留影





陈赓同志与胡志明主席研究越北边界战役计划

陳赓同志留念

运筹帷幄之中
决胜万里之外

胡志明



2.9.50

胡志明主席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给陈赓同志的赠语



身着越南人民军军服的陈赓同志



1950年夏，陈赓在越共中央的秘密营地受到胡志明主席(中)的欢迎。左二为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，右一为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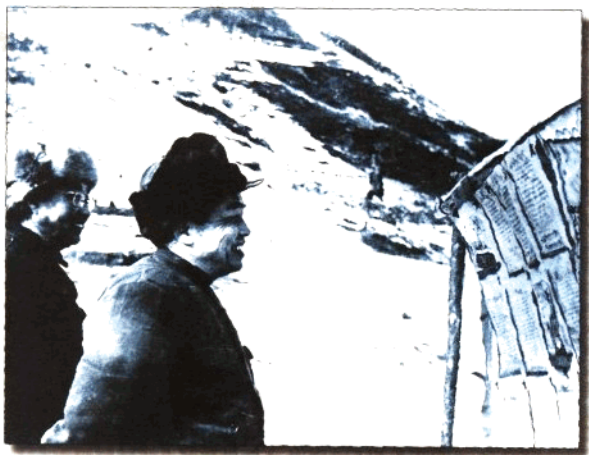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，陈赓自越战归来后，在中南海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工作



1951年，陈赓（右二）陪同彭德怀（右三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矿洞前会见金日成（左三）为首的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



1951年秋，陈赓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——桧仓郡矿洞留影



1951年冬，陈赓(左)与彭德怀(右)一起观看志愿军战士们的墙报



陈赓同志的部分日记本

写在前面

傅 涯

在纪念陈赓百周年诞辰之际，《陈赓日记》再版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他离开我们已有40多年，我也步入了耄耋之年。翻校他的日记时，我百感交集，心情难以平静。

我和陈赓初识于太行山——山西武乡蟠龙镇抗大总校校部训练部长王智涛、吴静（我的同队同学）家里，那是在1940年5月。1943年2月25日，129师师高干会议之后，我们结了婚。3天后，我便随陈赓调太岳区工作了。回到太岳军区司令部，陈赓给我看他的日记，他把自己的“过去”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了我。抚摸着他身上的6处伤疤，听着他讲述日记中有或没有记录的往事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
日记是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记起的。当我看到这些虽经数年依然保存完好、字迹清晰可辨的日记时，我顿时感到他真是细致，真是用功，这是个难得的好习惯。我曾用灰粗布糊了包皮，珍惜地加固日记

本。那时分多聚少，分别时我总要送给他一个本子，以便他再写日记。行军时，这些日记本始终珍藏在我简单的行李中，背着或放在马褡子里，伴随在我身边。那时常披星戴月、爬山涉水，每到驻地，先要把日记本拿出来检查一下，湿了就在太阳底下晒晒，或在老乡的热炕上烤烤，总怕丢了或损坏了。生死战乱，这些日记本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它长志气，灭敌威，深深地激励我、振奋我，为民族、为阶级翻身而努力奋斗。

1961年3月，在上海丁香花园，当他预感到生命无多时，他不断抚摸着已经磨破了的衬衣上那一片心口疼痛处，对我说：“我有两件事怕你经受不起，一，我要死了！二，你的更年期过不好。”即便此时，他仍不失幽默地比画着：“你的头发会‘唰’的一下就白了！”那时小建还不到16岁；小进不到11岁；小庶7岁，才上小学一年级，在住校；涯子不到6岁，还在幼儿园。陈赓记挂在心的是：“孩子太小，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爸爸，你要多和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。”这就是我着手积累和收集整理有关陈赓材料的初衷，并成为他去世后我的经常工作之一。我想，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母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件事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，批准我查阅他的档案材料；有许多同志热心相助，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。儿女们渐渐长大了，也和我一起查找。所有这一切努

力，可以从各个侧面了解他为什么忘乎一切投身革命的战斗生涯。也可以窥见他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，对事业的一丝不苟；危难中的机智勇敢，困境中的乐观豁达；同志间的诚挚友爱，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；也折射出陈赓的一生是那样光明磊落，肝胆照人。这些日记和资料是我和孩子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自1969年3月始，我先后被下放到东北、河南等地中组部干校。离开北京前，为防不测，我将陈赓同志的日记、照片、诗词、文稿和习字稿等遗物整理了几箱，和小孙女怀申一起送到上海大儿子知非家妥为保管。果然不久，北京家里无人时被强行搬家，而这些遗物则免遭损失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之时，陈赓被造谣说成是叛徒，我在干校则被指责有“特嫌”、为叛徒树碑立传。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，我才于1972年6月被批准回到北京，但组织问题仍没有解决。许多关心我的同志来看我，王震同志将我的信转呈给周总理、邓大姐。后来知道邓颖超同志和陈云同志质问过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，邓大姐问：“怎么回事？为何还把傅涯当叛徒的老婆对待？”陈云同志也作证说：“陈赓同志被捕后表现是挺好的，出狱后审查的组织结论，是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以后我当组织部长时做的，事情早有结论了，你们为什么现在还在整？”那位负责人始终支支吾吾。他

们的过问，才使我得以恢复组织生活，并由李德生同志批准搬回原居。在上海存放的陈赓遗物的箱子也由小孙女押运回来。此时我已是身心疲惫，全身浮肿，双腿痠疼，不得不住进了三〇一医院。

陈赓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后，见到肖华同志在报上发表的日记，曾对我说：“傅涯，你看看我的日记哪些可以发表？”我一直挂念着他的嘱托。1982年，解放军出版社（原战士出版社）出版了陈赓1937—1949年部分日记。因读者的欢迎，1984年，又出版了陈赓在越南和朝鲜战斗间歇中写的日记，内部发行。许多老同志来信或电话，说：“读日记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勾起了多少思忆！”我深受鼓舞。书中所收入的陈赓自传，是根据他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按组织上对外宣传需要所写的自传草稿整理的。此次再版的日记，将以上部分合并，又收入了他的一些来往信件（可惜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）。他的书信与日记一样，都闪耀着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的光辉，饱含着他对亲属的挚爱深情，对儿女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。我希望这份精神财富对研究老一代革命者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给后人一份激励，在新世纪继续发热发光，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增添力量！

2002年9月5日